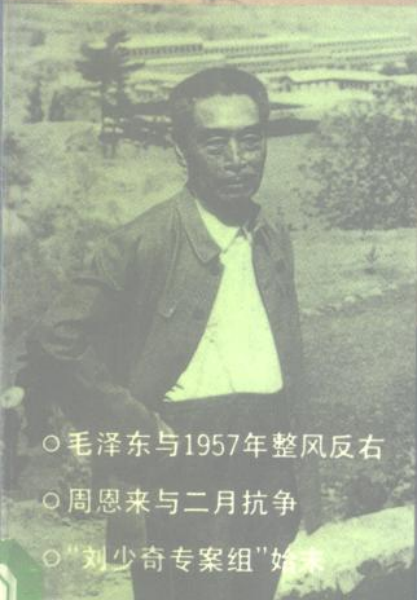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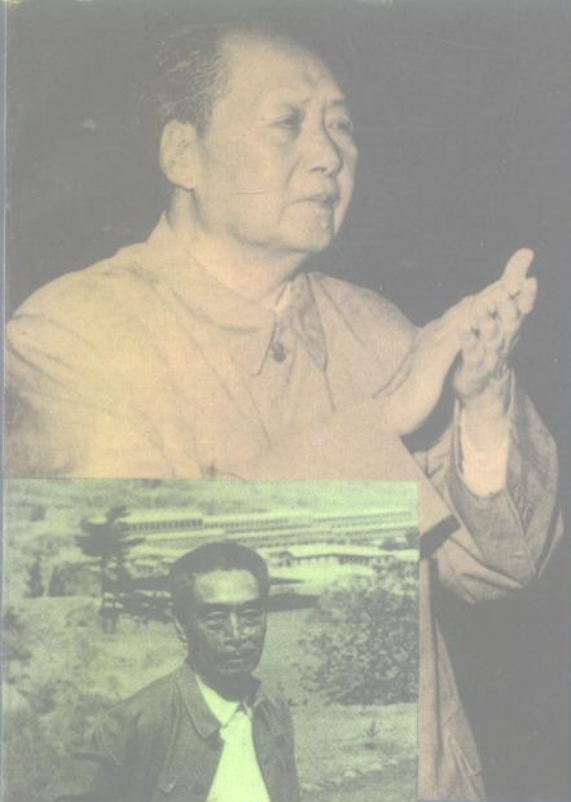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 重大事件述实



- 毛泽东与1957年整风反右
- 周恩来与二月抗争
- “刘少奇专案组”始末
- 邓小平历史上的几次反“左”斗争
- 风雨十年——朱德在“文革”中
-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真相
- 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设立国家主席问题的一场风波



人民出版社

07876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党的文献》编辑部编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侯俊智

装帧设计：王师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

ZHONGGONG DANGSHI ZHONGDA SHIJIAN SHUSHI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ISBN 7-01-001756-5

I. 中…

II. ①中…②中…

III. 中国共产党—历史—文集

IV. D23-53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 714 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25

字数：319 千字 印数：0—5,000 册

定价：12.00 元

目 录

朱毛井冈山会师亲历记	陈士渠 (1)
毛泽东与红四军七大前后的一场争论	王 华 (7)
毛泽东与宁都会议	黄允升 (19)
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	师 哲 (29)
毛泽东访苏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谈签纪实	师 哲 (45)
毛泽东与 1957 年整风反右	史 略 许脚脚 (59)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的纠“左”努力	严 文 (74)
毛泽东与 1961 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史 略 (94)
60 年代初毛泽东的纠“左”努力	柳建辉 史 略 (110)
在“不怕鬼”的背后	陈 晋 (128)

——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前前后后

周恩来与张学良	张勉堂 (144)
周恩来与班禅	杨明伟 (157)
周恩来在万隆	姚 力 (169)
周恩来亲自策划对美民间外交	谢 黎 (179)
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中苏边界谈判	柴成文 (189)
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余 湛 (200)
周恩来与特赦战犯	廖心文 (214)
周恩来与二月抗争	安建设 (225)

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	朱元石 (239)
刘少奇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事件	黄 峥 (252)
“刘少奇专案组”始末	黄 峥 (261)
邓小平历史上的几次反“左”斗争	杨 涛 王明鉴 (275)
风雨十年	康克清 (290)
——朱德在“文革”中	
请为人民鼓咙胡	静 川 (306)
——彭德怀在庐山	
彭德怀去西南三线的前前后后	郝和国 侯俊智 (320)
乌石之恋	彭传周 (331)
——彭德怀 1961 年回乡行	
庐山会议后的张闻天	程慎元 (340)
陈毅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次猛烈开火	罗英才 (347)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真相	邱南章 (357)
熄灭印度支那战火的卓越历史	徐 焰 (365)
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设立国家主席问题的一场风波	
.....	于 南 (376)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	魏史言 (384)
尼克松访华纪实	魏史言 (393)
林彪叛逃事件引起的国内政局变化	安建设 (405)
“雅典事件”始末	周伯萍 (413)
江青导演的“蜗牛事件”闹剧	史 实 (419)

朱毛井冈山会师亲历记

陈 士 渠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队经过“三湾改编”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但他一直关心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当时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均告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难思良将”，上山不久，毛泽东就委派何长工去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寻找朱德，相机也同附近地区的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何长工和我当初同是卢德铭警卫团的战士，我们俩又是同班战友，他当我的班长。参加秋收起义后又一起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何长工接受任务后，曾先后两次下山联系，三次见到朱德和陈毅等。第一次是1927年10月上旬从井冈山出发，到达长沙同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根据省委指示，他又绕道粤北，于12月中旬辗转到达广州。由于赶上广州起义，湘赣两省敌军大都向广东集中，镇压起义。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到了韶关。不意在澡塘洗澡时从两个敌兵的对话中，得到了朱德在犁铺头的消息。老何便星夜赶往犁铺头，见到了朱德、陈毅，还有蔡协民和朱德的参谋长王尔琢。

何长工作为毛泽东派遣的联络员，第一次见到朱德、陈毅等，时间大约在1927年12月下旬。何长工向朱德报告了来意，并将朱德也正要找毛泽东、已派毛泽覃（毛泽东胞弟）去井冈山联系和将要举行湘南暴动的消息，于1928年1月上旬带回了

井冈山。

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遂于1928年3月上旬，决定兵分两路去迎接朱德、陈毅上山，一路由何长工带领二团（即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经彭公庙向资兴前进；一路是毛泽东亲率一团作为左翼，入桂东、汝城之间，那时我正在一团任副连长（即副大队长）。当时的背景是不令毛泽东乐观的。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连续派来代表周鲁、杜修经等，批评毛泽东右了，即不执行所谓“以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的大烧大杀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毛泽东根本就不同意，并作了耐心的说服工作。怎奈两委代表态度傲慢，不予理睬。毛泽东很生气，在部队集合队前讲话时他气愤地说道：“我们犯了个大错误，没有执行烧杀政策。我们这次下湘南要大烧（房子）大杀！……”果然在从遂川撤回井冈山向湘南出发时，沿途写的标语都是“烧！烧！烧！烧净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子。”“杀！杀！杀！杀净一切土豪劣绅！”真是一片烧杀的气氛。当时我们都疑虑重重，觉得中国的革命这样烧杀下去能够成功吗？但谁也不敢流露真言，否则就有被梭标杀死的可能。当时子弹奇缺，为节省子弹平常杀人时多用梭标执行。但一些受“左”倾盲动思想影响严重的同志却不以为然，在经过酃县、中村镇到桂东的路上，连烧了几把大火。到了桂东，毛泽东专意看了看八面山，这是他率部上井冈山后经常提到的地方。八面山地处罗霄山脉南端，地跨湘赣粤，距广东东江和潮汕海口较近，东江地区有革命基础，也可以取得海外联系。这里地形地势险要，也是个适于军事割据，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在桂东得知朱德率湘南暴动的部队已经离开，便决定原路返回，也为朱德的部队断后掩护。当部队回到中村镇时，连住的房子也找不到了，那正是我们部队去桂东时自己烧掉的。面对一片断壁余烬的惨状，毛泽东就以

这一事实教育大家，他说：“你们看，我们比兔子还蠢。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我们竟把自己的窝都给烧掉了！”这使一些有“左”倾盲动思想的同志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途中获悉何长工已回到彭公庙，毛泽东指示，要他立即撤回井冈山，由毛泽东率一团在后掩护朱德。

这次长工同志带领二团行动比较顺利，到达资兴附近时，就碰到朱德的一支部队，即以邓允庭为师长的第7师。两军合并统一指挥，掩护朱德率领的暴动总指挥部撤退，在经旧县滁口时同范石生的第16军遭遇后，迅速北撤摆脱了范部的追击。北撤中意外地在资兴附近遇到陈毅率领部分暴动农军和湘南特委机关的同志，由郴州退到这里，他们共同商议到资兴以北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无奈湘南特委的负责同志“左”得厉害，拒不上山，也因井冈山是江西省地区，不愿离开湖南，不久便被敌人包围残酷杀害，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在彭公庙，何长工接到毛泽东要他撤回井冈山的指示，遂同陈毅率领部队到达酃县，在沔渡就见到了朱德和他率领的部队。会面后，朱德急忙问到毛泽东的情况，何长工一一向朱德作了报告，吃过饭便先足回到宁冈，为两军会师作准备工作去了。湘南暴动组建的部队经过茶陵县随后也来到了宁冈。

二次下山，何长工一会陈毅，二见朱德，时间相近，都在4月中下旬。4月24日，何长工率二团回到耒市。两天后，朱德、陈毅等率领部分直系部队也进山来到耒市。我们到达沔渡时，得到朱德业已上山的消息，时隔两三天，我随毛泽东率领的一团赶回耒市，朱德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进山来。当时我听说有的部队开始不愿意进山，后经朱德、陈毅等再三做工作，而且朱、陈率先进了山，主力部队便随后跟来了。但朱德并未去茶陵，而是经酃县的沔渡直接上山的。

何长工虽有两次下山，三次会见朱德、陈毅的情况，但不能称作会师。第一，何长工是作为毛泽东派遣的联络员，任务很明确，去寻找朱德、陈毅及其部队的。我从未听何长工说过他是会师的代表，而且还有这么几次会师。既然历史如此，后人就无需再委加其任了。第二，如果把同朱德、陈毅等的会见和其所属部队的偶然相遇都说成是会师，那么，这种会师就不下五、六次了。因何长工第二次下山，还带部队于资兴一带见到了朱德所部第七师。毛泽东率一团在资兴的龙溪洞与肖克独立营相会，随即分手。倘若把时间再往前推，即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南去八面山时，经遂川大汾突遭敌民团袭击，其中三营由营长伍中豪率领继续南下，不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后收容下来的部队会合，并得到部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充。不久，一团团部和一营占领茶陵县城后，于10月中旬又返回茶陵的途中再次同他们相遇。不到一个月，仅一团就同这支收容的部队相遇两次，这种偶然的相会在当时是经常出现的。像这样，见面即会师，会师即见面，是否把会师这一严肃而重大的军事行动理解得太简单、太轻率了。以此类推，那这会师也就太多了。第三，第二次下山是由毛泽东、何长工分别率部去迎接并掩护朱德、陈毅及其部队上山的，故当何长工与陈毅在彭公庙偶然相遇后，毛泽东就派人指示他速返井冈山，以提前做会师的准备工作。如果毛泽东说：何长工，你那儿会师完了，赶快回来再准备会师。这岂不成了笑话。因为会师的目标地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井冈山，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所谓沔渡会师，也是查无实据。当时的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虽也见过朱德、毛泽东，但他从未得到过朱、毛在酃县沔渡会师的打算和消息。如果朱德和毛泽东拟在沔渡会师，当朱德率部先抵沔渡并从何长工那里知道毛泽

东率部正在其身后掩护他们的时候，我相信，朱德决不会不等毛泽东而匆忙离开沔渡，因为那样做，对与毛泽东会面渴望已久的朱德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

何长工4月24日返回井冈山，大约两天后，朱德率直属部队上了山；大约又晚两三天，毛泽东率一团、朱德所部主力部队也都分别赶到井冈山来了。因此，朱德、毛泽东及其所率部队正式会师的时间应该是4月28日左右，或者说就是1928年的4月底的一天。

我清楚的记得，这天天气很好，苍市披上了春日的盛装。翠绿的井冈山碧清如洗，充满生机，显得格外巍峨壮观；稻田葱绿滴翠，在春风吹拂中散发出诱人的清香；暖暖的太阳高悬苍穹，照得溪水粼粼闪光，照得林中的鸟儿亮声歌唱。干部战士们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欢声笑语，喜泪涌流，宁静的山中平原显得十分地热闹。就在宁冈苍市，朱德和毛泽东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支革命队伍历经艰难波折，终于胜利会师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28年5月4日上午，在苍市东边广场即红四军教导队操场，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朱德、毛泽东、王尔琢及党政军各界代表都分别讲了话。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会上宣布全体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还有一条大会没有宣布的消息，就是毛泽东兼第11师师长，朱德兼第10师师长。毛泽东第一次挎上了匣子枪，显得非常兴奋，诙谐地说道：“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可见，会师既给军民增强了信心和力量，也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和喜悦。但毛泽东很快就把驳壳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身上带过枪。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

著名论断、通晓兵法、运筹帷幄的军事大家毛泽东，却并不喜欢带枪，这倒很有意思，也许这就是这位巨人性格的一大特征。

（刘思蕾整理）

毛泽东与红四军七大前后的一场争论

江 华

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县城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围绕着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当时，我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现根据我亲身经历，对60年前的这场争论回忆如下，以供研究这段历史之参考。

在胡雷开始了争论

七大的争论，其实从永定县胡雷的前委会议上就已开始，争到上杭县的白砂、连城的新泉，又争到龙岩七大。分歧的由来更久，从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以来，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在红四军党内以及主要领导者之间即有一些不同意见，并且在行动上也有所表现。所以，七大的争论，实质上并非单纯为军委这一机构是否设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到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

为了说明争论的问题，先从争论的焦点军委问题说起。

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并成立了红四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军委书记。5月20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6月4日，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指定，由毛

泽东、朱德和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前委所在地党部书记等5人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前委是红军游击活动期间的特殊组织，是共产党的代表机构，它的组织成员是由中央指定的，它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其游击活动地区、农村根据地的地方工作。6月下旬，湖南省委派杨开明代理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1月初，根据中央的指定，经前委提名报中央批准，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谭震林（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为前委委员。同月中旬，红四军六大选举了新的军事委员会，朱德接替陈毅担任军委书记，陈毅改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那时，红四军未建政治部，只有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谭震林，它实际上是政治部的前身。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打仗，形势严峻，常要开会讨论军情和部队行动问题。这样，军委和前委机构就显得重叠，开了军委会又要开前委会，或者开了前委会还要开军委会，而又多是同样一些人，大家都感到“颇生麻烦”。为应付恶劣环境，减少领导层次，便于机断，在项山整编时，前委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同年3月，打下汀州后，部队整编，取消了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改建为红四军政治部。政治部从建立之始，即是在前委领导下的代表党的工作机关，除负责军内的政治工作外，如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宣传，建立地方武装和苏维埃政权等工作，统由政治部负责，即所谓“前委指挥，政治部对外号召和联系”。

5月间，由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多了，前委既管军队工作，又管地方工作，感到兼顾不过来，为了便于领导，前委临时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委，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四川人，曾

入云南讲武堂，后去苏联留学，1929年春由党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他曾经讲过关于苏联黑暗面的话，听来令人很反感。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利用战斗和行军的空隙，采取各种措施，作了不少工作，并多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5月底，胡雷前委会议上对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争论，意见未能统一。6月8日，在白砂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争论的问题。这次会议虽然以绝对多数（41人参加会议，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却仍未解决，而且这些分歧意见在党内以至在红军战士、军官中日益发展起来。

由于红四军党内对一些原则问题认识不尽一致，毛泽东认为前委不好工作，于是，他在白沙会议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书面意见有四条：一、前委、军委成为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二、根本分歧在前委、军委。三、反对党管一切（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于前委了），反对一切归支部（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自由（一支枪也要问过党）。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四、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

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做不起来。最后，毛泽东提出，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毛泽东，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

白砂前委会议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军委书记自然免职。但是，在前委之下要不要设立军委这一组织，军内及主要领导人之间仍有不同意见。尤其是刘安恭更是到处游说，坚持要成立军委的意见，事实上是主张“分权主义”，并说什么红四军党内分成派别等等，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红四军主要领导之间的关系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他的这种“不调查清楚事实状况”就“偏于一面”的“轻率发言”，起了很坏的作用，造成了军内官兵思想混乱，助长了党内领导者认识上的分歧，而且使争论复杂化了。后来，陈毅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刘安恭来红军后的一些言行，是造成党内和领导间争论的一个主要原因。

6月中旬，国民党地方军阀陈国辉部由广东潮、梅地区窜回龙岩城。前委由新泉移住到小池，准备三打龙岩，彻底消灭陈国辉部。在小池发生了一件事：在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时，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只通知谭震林参加，由谭传达，在这次战斗中，毛泽东、谭震林、我和前委、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随同新由闽西地方游击队编成的红四军支队张鼎丞部行动。这

样重要的会议以及如此的行动，不通知党代表毛泽东参加，是很不妥当的。

三克龙岩后，部队在龙岩整训 20 余天。很明显，在当时敌强我弱、不断被敌围剿、战斗十分紧张的环境中，革命队伍内部尤其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对革命是不利的。于是，前委决定利用这一短暂稳定的时间，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是在龙岩城内的一所中学校里召开的，我负责会议的秘书事务工作。原计划会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会议开了一天，虽然通过了决议案，选举了新的前委会，但对从七大前就开始争论的主要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争论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在 6 月 14 日的一封亲笔信中，对争论的问题列举了 14 条：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对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对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范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他还指出，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现在时代军委要不要的问题。

关于军委要不要的不同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种意见认为：既有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

党的组织系统；并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等等，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有“家长制”的倾向，是“书记专政”。其言外之意，只有成立了军委，才能改变如其所说的这种状况。

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认为：现在红四军只是有4000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又处在游击不定、频繁行军作战的环境里，“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因此，有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而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十分明白的，在实际上不需要的；并认为，坚持设立军委是“形式主义”，“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所谓“前委管的太多”等说法，只不过是“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提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这实际上是“分权主义”，而这种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工会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其他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最后，七大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认为这确系机关重叠，无再设军委之必要。在七大决议中还指出：“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谓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书记专政”问题，是“纯属偏见”。

要不要军委的争论虽然解决了，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都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